

小说界域的划定与研究方法的衍生

——《金瓶梅》百年研究史及研究个案考察

王炜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小说界域的划定与研究方法的衍生

——《金瓶梅》百年研究史及研究个案考察

王炜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说界域的划定与研究方法的衍生:《金瓶梅》百年研究史及研究个案考察/王伟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6

ISBN 978-7-307-15919-8

I. 小… II. 王… III. 《金瓶梅》—文学研究 IV. I207.4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18785 号

责任编辑:胡程立 陈 翩

责任校对:汪欣怡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17.75 字数: 255 千字 插页: 1

版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5919-8 定价: 54.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中国学术转型期(1911—1937)的《金瓶梅》研究	13
第一节 20 世纪前期的《金瓶梅》研究状况	13
第二节 鲁迅的《金瓶梅》研究与现代小说研究范型的建立	35
第三节 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与小说文本批评的滥觞	54
第四节 吴晗研究《金瓶梅》的路径、视角及学术取向	77
第二章 中国学术定型期(1938—1978)的《金瓶梅》研究	97
第一节 20 世纪中期的《金瓶梅》研究状况	98
第二节 冯沅君的《金瓶梅》研究与小说史料学的兴起	127
第三节 夏志清的《金瓶梅》研究与小说内在规律性的发现	139
第四节 孙述宇的《金瓶梅》研究与小说“细读法”	156
第三章 中国学术发展期(1979 年以后)的《金瓶梅》研究	196
第一节 1979 年以后的《金瓶梅》研究状况	196
第二节 徐朔方的《金瓶梅》研究与中国本土小说批评体系的确立	202
第三节 黄霖的《金瓶梅》研究与中国本土小说理论的建构	226
第四节 梅节的《金瓶梅词话》校勘	244

第五节 陈文新研究《金瓶梅》的辨体意识与会通精神	257
结语.....	274
参考文献.....	276

绪 论

20 世纪，中国的知识体系完成了从传统向近现代的转型。随着近现代文学学科的生成、建构、定型和发展，《金瓶梅》等白话作品被归于“小说”这一概念之下，成为文学本体核心的构成要素。学界围绕《金瓶梅》展开的研究，与小说研究、文学研究形成了同构的关系。百余年间，《金瓶梅》等小说的研究史，是这些作品被纳入近现代文学学科之内的历史，同时也是学界重新确定小说的典型范例、划定小说界域的历史。

在近现代学术体系的构架中，《金瓶梅》研究出现了几个热点。这包括《金瓶梅》的作者研究、《金瓶梅》中涉及的文献材料研究、《金瓶梅》中的人物形象研究、《金瓶梅》在小说史上的统系归属研究。学界围绕着这些问题反复进行了讨论。这种反复并不是简单的重复。从长时段来看，学界围绕某些问题反复展开研究，正是推动《金瓶梅》成为小说的典型范例的动力之一。在反复的研讨中，学界的不同声音、不同观念促成了人们对《金瓶梅》这部作品、对其他小说，乃至对于文学的认识不断地走向深入。在这些看似循环往复的研究中，研究界的学术方法、学术观念，乃至相关的概念、命题不断更新。

一

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知人论世”是一条重要的学术路径，也是研治集部诗文的最基本的方法。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金瓶梅》等作品作为特定的知识要素被正式纳入学术研究的体系，纳入全新的文学学科的界域。这一时期，学者从传统的治学路向出发，围绕《金瓶梅》等作品的作者问题展开深入的研究。

当《金瓶梅》这部作品进入近现代学术体系的范畴之时，学人面临的状况是，《金瓶梅》署名兰陵笑笑生，但笑笑生究竟是谁，学界却一无所知。他们查到的较早的关于这部书的记载主要有这样几条：一是，万历二十四年（1596），袁宏道在给董其昌的信中，谈到这部书说，“《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①。二是，万历四十二年（1614），袁中道谈到，《金瓶梅》的作者是“绍兴老儒”。他说：

旧时京师有一西门千户，延一绍兴老儒于家，老儒无事，逐日记其家淫荡风月之事，以西门庆影其主人，以余景其诸姬。琐碎中有无限烟波。^②

三是，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金瓶梅》的作者是“嘉靖间大名士”^③。袁中道等人谈到《金瓶梅》作者的身份、生活状态，但是，这部作品的归属权始终没有与某一个具体的人建立起关联。

《金瓶梅》的作者没有在这部作品中印刻下自己的名字，原因是多重的。从文学文体自身的发展来看，明代是中国长篇白话小说的发展期，《三国演义》、《金瓶梅》的作者虽然有着清晰的写作意识，但他们尚未形成作品归属权的意识。长篇白话小说的这种情况与五言诗在发展之初的情况是一致的。以古诗十九首为参照，我们可以看到，在五言诗被文人化之初，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着意于文本抒发的情感，不大关注作品的归属问题。当五言诗完全定型，特别是这种诗体在数量、规模、质量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之后，人们才开始追问古诗十九首的作者。《金瓶梅》等明代四大奇

^① 袁宏道：《董思白》，见袁宏道著，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89页。

^② 袁中道：《游居柿录》，见袁中道《珂雪叁外集》卷九，万历四十六年（1618）刻本。

^③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52页。

书的情况也是如此。中国的长篇白话小说在明代有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三国演义》、《金瓶梅》等作品。到了清代,随着小说的繁盛,《金瓶梅》的影响渐广,人们试图确认这部作品的具体作者。有人提出,《金瓶梅》的作者是“凤洲(王世贞)门人”。之后,谢颐认定,《金瓶梅》的作者就是王世贞。我们可以看到,当《金瓶梅》等作品逐渐进入严肃的学术领域,即将成为主流的知识体系建构的一部分时,辨明这些作品的作者问题,成为学界的研究重心之一。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学者们开始追索《三国演义》、《金瓶梅》等明代长篇白话小说的作者情况。在确定这些作品的作者的过程中,《金瓶梅》的情况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不同。学界对《三国演义》等小说的作者进行了确认,面对《金瓶梅》,学界所做的却是“辨伪”的工作。吴晗、郑振铎等人论证了《金瓶梅》的作者并非王世贞。但是,《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谁,学界并没有给出确定的答案。到了20世纪后期,朱星发表一系列论文,重新考证《金瓶梅》的作者是王世贞。王汝梅、周钧韬等一批学者撰文支持“王世贞说”。但是,这一观点也遭到部分学者的反对,各家纷纷提出自己的看法。徐朔方、吴晓铃、卜键、王利器等主张李开先说,黄霖有屠隆说,张远芬有贾三近说,鲁歌、马征有王稚登说,吴红、胡邦伟有冯梦龙说,美国学者芮效卫有汤显祖说。另外,也有学者提出徐渭、唐顺之、李贽、冯唯敏、卢楠、沈德符、梅国桢门客、丁耀亢、陶望龄、贾梦龙、谢榛、田艺蘅、王世贞门人等诸多假说。

在《金瓶梅》的作者问题上,学界还有另外一条研究路向——集体创作说。20世纪中期,孙楷第、冯沅君等学者提出《金瓶梅》可能并非文人的独立创作。到了50年代,潘开沛撰文,再倡“集体创作说”。徐梦湘撰文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反驳。1968年,夏志清在美国出版《中国古典小说》,又对潘开沛的集体创作说给予支持。1980年,徐朔方在20世纪前中期学界研究的基础上,围绕《金瓶梅》的成书,提出一个全新的概念——“写定者”。他认为,在《金瓶梅》成书之前,相关的素材已经有了充分的累积,直到这个“写

定者”将这些材料汇聚起来，并加工整理，《金瓶梅》才正式完成。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到21世纪，《金瓶梅》是否为历代集体编著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

20世纪初期以来，学界关于《金瓶梅》作者的诸多论争大体可归纳为三个研究点：（1）《金瓶梅》是集体创作，还是个人创作；（2）作者是大名士，还是中下层文人；（3）作者是北方人，还是南方人。到了21世纪，有学者对学界研究《金瓶梅》的作者这一路向提出了质疑。如，刘世德说：

《金瓶梅》的作者叫兰陵笑笑生，既然《金瓶梅》可以叫“金学”，《红楼梦》可以叫“红学”，现在有那么关于《金瓶梅》作者的论文著作，是不是也可以叫作“笑学”！所以，我说：“笑学”一切都是猜测。^①

刘世德的看法是，“笑学，首先非常可笑，其次，是不科学的”^②。针对这种看法，黄霖谈到，《金瓶梅》作者的研究具有不可小视的重要性。他说：

《金瓶梅》作者研究……不仅仅关系到一部书的一个作者研究的问题，它实际上关系到如何对待古代文学研究的一系列问题，关系到如何正确地估价学术研究的成败得失，乃至关系到古代文学研究的学风与思想方法等等。^③

黄霖还说，“《金瓶梅》作者研究目前的确存在不少问题，但是，无论从

① 刘世德：《〈金瓶梅〉作者之谜》，见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Chinese/RS/1247290.htm>，2006年7月2日。

② 刘世德：《〈金瓶梅〉作者之谜》，见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Chinese/RS/1247290.htm>，2006年7月2日。

③ 黄霖：《“笑学”可笑吗——关于〈金瓶梅〉作者研究问题的看法》，《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考证‘前提’还是考证方法来看，其研究工作都不是一条死胡同”^①。

立足于中国文学学术史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学界从《金瓶梅》的作者这个问题出发，在研究路向上所做的拓展和转变。在明代，人们不大关注《金瓶梅》的作者问题；到了清代，随着《三国演义》、《金瓶梅》这类作品在数量、规模、类型上的累积，学界开始借鉴传统的诗文研究方法，对它们展开研究，确认作者情况。20世纪前期，学界否定了清人的看法，但是，从治学方法上，他们仍然延续清人考辨作者的路向前行。20世纪50年代以后，潘开沛、徐朔方等一大批学者对《金瓶梅》“集体创作说”的探讨，推动学界由关注某本书的作者，转向考察中国古代小说的成书性质和成书规律。从这个角度看，学界对《金瓶梅》作者的关注，正与《金瓶梅》等特定类型的知识要素进入小说的统序、进入文学的统序的过程相关，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金瓶梅》作者的考察，发现并确认了明代小说成书的规律性，推动了本土化的小说理论的建构进程。在学者的论争中，人们对于中国古代小说，准确地说，是对明代长篇白话小说的成书规律，有了越来越清晰、深入的认知。

《金瓶梅》的成书年代，与《金瓶梅》的作者问题具有紧密的关联性。这也是《金瓶梅》研究中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明人认为，《金瓶梅》成书于嘉靖年间。到了清代，有人提出了“万历说”。20世纪初期，吴晗、郑振铎在否定《金瓶梅》的作者是王世贞的基础上，转而着手考察这部小说的成书年代。吴晗在《〈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中，以“马价银”、“皇庄”为切入点，他得出的结论是：《金瓶梅》成书的时间应该是万历十年到三十年，最早也不能早于隆庆二年（1568），最迟也不能晚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郑振铎则认为，《金瓶梅》的成书年代不早于万历年间。

^① 黄霖：《“笑学”可笑吗——关于〈金瓶梅〉作者研究问题的看法》，《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学界对刘世德提出的“笑学”的回应，另参见杜贵晨《〈金瓶梅〉研究不妨有一个“笑学”》，《古典文学知识》2009年第6期。

万历说得到大部分学者的认可。到了20世纪80年代,又有学者对“万历说”提出质疑,重倡“嘉靖说”。学界对《金瓶梅》成书年代的考察正是沿着“知人论世”的路向,在《金瓶梅》的作者未能确认的基础上,试图从新的思路出发,尽可能地在时间的维度上对《金瓶梅》做出准确的定位。

二

《金瓶梅》研究的另一个热点是,剖析这部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明清时期的小说评点中,不乏对人物性格、行为逻辑的点评,但这些点评往往以文本为中心,随文生发。到了20世纪,在近现代学术体系下,学者转而以个人对人物的理解为中心,对某一个或某几个人物进行系统的研究。他们的论点以文本为依据,但是,立论的过程却是以作品中人物的行为方式为逻辑。

20世纪前期,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一文较为详尽地探析了西门庆发迹变泰的过程,郑振铎将西门庆定位为“十足的土豪”、“兼并、诈取、搜刮老百姓的钱财”的商人及官僚。^①张天畴的《金瓶梅词话里的帮闲人物》将帮闲作为一个群体进行审视,孟超的《金瓶梅人物小论》对《金瓶梅》中的27位人物进行了细致的评析。郑振铎、张天畴、孟超等的文章开拓了《金瓶梅》人物研究的路径。从立论的体例上看,20世纪前期,学者在对《金瓶梅》中的人物形象或其他问题展开剖析时,既有郑振铎、吴晗等人的结构完备、逻辑严密的论文,也有解弢《小说话》、阡铎《红楼梦抉微》那样点评式的论述,或者是赵景深的《〈金瓶梅词话〉随录》那样的,随手摘录读书的内容,并逐条辨析,类似于清代学人常用的“条辨”体。20世纪中期以后,中国学术研究由传统正式向现代化转型。在《金瓶梅》研究中,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传统的评点的方式已经彻底隐去,论文的体式成为学界普遍采用的表述方式。20世纪50年代,人物形象研究这一批评范式已经完全定型。在研究《金瓶梅》的诸多的论文、论著中,香港学者孙述宇的《金瓶梅的艺术》融会了传

^① 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文学》1933年第1卷第1期。

统的评点法以及英美新批评的“细读法”，对《金瓶梅》中的人物形象进行细致的剖析。孙述宇主张，在剖析文本中的人物形象时，要立足于人性的立场，要“不存偏见”地阅读。如，谈到妓女这个群体，孙述宇说，妓女就是活生生的普通人，与良家百姓比，她们不会更邪恶，也不会更善良；不会更堕落，也不会更高尚。孙述宇细致地剖析了《金瓶梅》中各类人物无力控制自己命运的悲剧感。孙述宇的《金瓶梅的艺术》是《金瓶梅》批评史，乃至近现代的小说批评史上人物形象批评的典范之作。20世纪80年代，随着社会的变迁，整个社会对商品经济的关注，有学者在新的情势下，对《金瓶梅》中的人物形象进行重新定位。如，卢兴基提出，西门庆是“16世纪中叶我国封建末世资本主义时期的一个新兴商人”，“也正是在朝向第一代商业资产阶级蜕变的父祖”^①。学界也涌现出一大批分析《金瓶梅》人物形象的专著，如，石昌渝和尹恭弘的《〈金瓶梅〉人物谱》、鲁歌和马征的《〈金瓶梅〉人物大全》、孔繁华的《金瓶梅的女性世界》、陶慕宁的《金瓶梅中的青楼与妓女》、王汝梅的《金瓶梅女性世界》、陈桂声的《金瓶梅人物世界探论》、田秉锷的《〈金瓶梅〉人性论》等。

立足于近现代文学学科的建构来看，20世纪前期，《三国演义》、《金瓶梅》等作为一类知识要素，成为文学学科的研究对象，《金瓶梅》等“小说”与传统集部中的诗、文、赋构成了统一体。小说在与诗、文的参互、对照中，见出自身的核心的特质。那就是，“人物”的行动逻辑是小说根本的构成要素，“人物”在诗、文中则不是必需的存在物。可以说，20世纪以来，学界在进行小说研究时，多采用人物形象分析这一研究手法，这正突显出了小说在文学学科研究中的独立的特性。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物形象分析法更成为学界研究的核心范式之一。学者们以个人对于人物形象的理解为基础，把20世纪前期《金瓶梅》研究中建构的各种方法、观念、要素整合于一体，推进了学界对《金瓶梅》这部小说的认识的

^① 卢兴基：《论〈金瓶梅〉——16世纪一个新兴商人的悲剧》，《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

深化,同时,也进一步突显了小说与诗、文的区别,发现并强化了小说以人物、情节、环境为组成要素的本质特征。

小说经由其中的人物、情节,与现实社会建立了直接的、多层次的关联。20世纪以来,学者在分析《金瓶梅》的人物形象的同时,关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人物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关系。“真实性”,成为小说研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20世纪前期,吴晗、郑振铎等人在研究《金瓶梅》时,他们提出了小说的“真实性”问题。他们关注小说中的人物与现实世界中特定的王朝、特定的历史阶段之间的关联。为此,他们在作者无法确定的情况下,试图对文本产生的时代进行定位。到了20世纪中期,孙述宇在研究《金瓶梅》时,他与吴晗、郑振铎等人的一致之处在于,他们都强调《金瓶梅》这部小说的“真实性”,关注人物与现实之间的对应关系。但是,对他们来说,“真实”的指向性却有着根本的不同。郑振铎等人强调“真实性”,他们的终极目的是,要借小说改造社会,并进而改造《金瓶梅》中描绘的人的这种“真实性”。孙述宇的目的不在于批判社会,而在于展示人性。孙述宇提醒读者,“不存偏见”地面对这种“真实”,并以悲悯的心态接纳、包容这种“真实”。

20世纪以来的百余年间,围绕着《金瓶梅》塑造的人物形象,围绕着这些人物与现实的关系,学界对“真实性”的剖析,与其他的小说研究一道,引发了多个文学命题,衍生出多个文学概念,推生出多种研究方法和研究观念,推动了本土化的中国小说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完善。在这些文学命题、文学观念中,比较重要的有,关于《金瓶梅》是不是“现实主义”作品的讨论、《金瓶梅》的思想内容的讨论等。学界关注《金瓶梅》这部小说的思想内容,这种研究路向也是在人物塑造这一研究范式的基础上,不断发展而来的。20世纪60年代,任访秋撰文提出,《金瓶梅》的作者之所以能够刻画西门庆“这样一个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与历史意义的典型,就在于他对当时社会现实进行了深刻的观察”^①。到了20世纪80年代,

^① 任访秋:《略论〈金瓶梅〉中的人物形象及其艺术成就》,《开封师院学报》1962年第2期。

学界对《金瓶梅》的思想倾向展开了系统的研究,学者的观点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态势。如,黄霖等学者将《金瓶梅》定位于“暴露文学”,他认为《金瓶梅》旨在批判社会丑恶;魏子云提出“政治讽喻说”,他认为《金瓶梅》是对明神宗的政治讽喻;刘辉提出愤世嫉俗说;胡邦炜则认为《金瓶梅》是对新兴市民阶层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有学者提出人生欲望说、文化悲剧说等。20世纪80年代以后,一直到21世纪,也有学者从民俗学、经济学等角度对《金瓶梅》展开研究,内容涉及宗教文化、性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风俗民情等,拓展了《金瓶梅》研究的路向,推动了学界多层面、多角度地理解《金瓶梅》这部小说。

三

百余年来,从文献着手对《金瓶梅》进行研究,也是学界的一条重要的路向。这些研究成果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从文献整理入手,对《金瓶梅》文本的发现与梳理,对相关研究材料的汇集;二是从小说史科学入手,梳理《金瓶梅》中留存的词曲史料;三是从语言学研究入手,清理《金瓶梅》中包含的语言素材,特别是方言素材。

《金瓶梅》主要有说散本和词话本两个版本统系,主要的刻本有《新刻金瓶梅词话》、《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以及清代张竹坡《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等。20世纪30年代,明万历丁巳刻本《新刻金瓶梅词话》被发现。后,日本慈眼堂本《金瓶梅词话》、栖息堂本《金瓶梅词话》被发现,对《金瓶梅》的点校、出版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有学者认为,这三种词话本系同一刻本。较早对《金瓶梅》的版本进行研究的是郑振铎、周越然等人。郑振铎在《谈〈金瓶梅词话〉》中对不同版本的文本进行了对比,周越然于1935年发表了《〈金瓶梅〉版本考》。另外,日本的鸟居久晴、长泽规矩也、小野忍以及美国的韩南等学者深入地探讨了《金瓶梅》的版本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内地学者刘辉、王汝梅,香港学者梅节等对《金瓶梅》的版本展开了系统的研究。20世纪,不少学者和出版社致力于对《金瓶梅》的影印或点校出版工作。在这些版本中,

比较重要的有古佚小说刊行会 1933 年影印出版的明万历丁巳刻本《金瓶梅词话》、日本大安株式会社出版的《金瓶梅词话》、台湾增你智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的《金瓶梅词话》、香港太平书局出版的《全本金瓶梅词话》、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齐鲁书社出版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王汝梅校点)、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中华书局出版的《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香港梦梅馆出版的《梦梅馆定本金瓶梅词话》(梅节校订)、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金瓶梅词话》(戴鸿森校点)、岳麓书社出版的《金瓶梅词话校注》(白维国、卜键校注)等。百年来,《金瓶梅》的译本也大量涌现。较早的译本有 1923 年井上红梅日文译本、1925 年夏金畏及山田正文日文译本、1927 年塞缪尔·巴克泽的英译本、1929 年莫朗的法文译本等,目前,《金瓶梅》已有日文、英文、德文、法文、朝鲜文、俄文等各种节译本。2013 年,芮效卫完成了《金瓶梅》全本的英文翻译工作。英译版《金瓶梅》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

围绕着《金瓶梅》研究,学者还编撰了大量资料汇编。1940 年,姚灵犀的《瓶外卮言》由天津书局出版,这是《金瓶梅》研究史上第一部论文集。1963 年,日本大安株式会社出版了一系列研究《金瓶梅》的论文集,如《金瓶梅特集》研究专号、《金瓶梅论文集》等。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金瓶梅》研究的论文集不断涌现。如,1981 年朱传誉主编的《笑笑生传记资料》及日本学者泽田瑞穗主编的《增修金瓶梅资料要览》,1985 年侯忠义、王汝梅编《金瓶梅资料汇编》,1985 年朱一玄编《金瓶梅资料汇编》,1987 年黄霖编《金瓶梅资料汇编》,1999 年朱一玄、王汝梅主编《金瓶梅古今研究集成》。另如,胡文彬及张庆善选编《论〈金瓶梅〉》、方铭编《金瓶梅资料汇录》、胡文彬编《金瓶梅书录》、蔡国梁选编《金瓶梅评注》。又如,徐朔方编选的《金瓶梅西方论文集》、黄霖及王国安编译《日本研究〈金瓶梅〉论文集》、石昌渝及尹恭弘编《台港〈金瓶梅〉研究论文选》。

《金瓶梅》中留存的文学史料,是 20 世纪前中期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20 世纪初,吴晗、郑振铎等从《金瓶梅》中留存的戏剧史

料入手,确证这部小说的成书年代。之后,冯沅君在这一研究路向进一步前行,有意识地拓展出小说史料学的路径。她通过搜集、整理《金瓶梅》中留存的戏剧史料,确证《金瓶梅》这部小说的特点,考察明代戏曲演出的情况。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韩南更为系统地对《金瓶梅》中的戏曲史料进行了细致的梳理。20世纪80年代后,考察《金瓶梅》中留存的文学史料,这种研究方法渐渐退出了学界关注的视野。从文学学术史的角度来看,20世纪前中期,近现代文学学科处于定型阶段,小说作为一种全新的要素被纳入文学的界域,学界不仅需要确认小说在文学学科内所具有的独特性,同时,也要确定它与其他文体类型之间的亲缘关系,因此,《金瓶梅》等小说留存的相关的文学史料,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20世纪80年代,人们关于文学学科的建构已达成共识,甚至已经普及成为一种“常识”,人们不再关注小说中包含的其他文体材料,搜寻《金瓶梅》中包含的戏曲史料这一研究方法也渐渐隐退。

20世纪80年代以后,《金瓶梅》研究衍生出全新的方法,学者开始从语言学与文学的交叉研究着手,对《金瓶梅》进行研究。明代是近代汉语向现代汉语过渡的重要时期,《金瓶梅》中保留的明代民间语言成为弥足珍贵的语料库。不少学者专门针对《金瓶梅》的语言做了注解考释,着重于对方言俚语进行释义。其中,代表性的成果有王利器的《金瓶梅词典》、白维国的《金瓶梅词典》、张鸿魁的《金瓶梅字典》、李布青的《金瓶梅俚语俗谚》、李申的《金瓶梅方言俗语汇释》、张惠英的《金瓶梅俚俗难词解》、傅憎享的《金瓶梅隐语揭秘》、刘敬林的《金瓶梅方俗难词辨释》、褚半农的《〈金瓶梅〉的上海方言研究》等。学者还通过研究《金瓶梅》中的方言,探寻这部小说的作者。据张玉萍《〈金瓶梅〉方言问题综述》统计,1986年至2002年,就《金瓶梅》中的方言,学界有山东方言说、河北方言说、北京方言说、河南方言说、山西方言说、内蒙古西部方言说、兰州方言说、江淮次方言说、武当山伍家沟方言说、吴方言说、扬州方言说、湖南平江方言说、临川方言说等十多种说法。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者对《金瓶梅》中的词汇、句式、语法展开研究,专著有鲍延毅的《〈金瓶梅〉语词溯源》、张鸿魁的《金瓶梅语音

研究》、潘攀的《金瓶梅语言研究》、章一鸣的《〈金瓶梅词话〉和明代口语词汇语法研究》、吴锡根的《金瓶梅词话特殊句式研究》、郑剑平的《金瓶梅语法研究》、许仰民的《〈金瓶梅词话〉语法研究》等。这些著作、论文推进了汉语史的研究，也为金学其他方向的研究提供了基础性资料。

本书从中国知识体系的建构的角度出发，在知识统系的建构、变更的过程中，梳理《金瓶梅》的研究史，阐明 20 世纪以后的小说观念，剖析《金瓶梅》研究在中国学术发展的不同阶段呈现的特点。本书既关注百余年间《金瓶梅》研究的整体状况，也关注《金瓶梅》研究中的个案，甚至可以说，个案研究是本书更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本书的特点是，以例带类。这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以《金瓶梅》研究为例，试图追溯近现代学术体系中作为知识类别的“小说”的建构情况，窥见“小说”这套知识类型定型之后，它的研究方法、研究观念、研究理念、研究体系，乃至理论批评体系的衍生和演化情况。二是以鲁迅、吴晗等 10 位学人为例，试图剖明近现代以来学者的学术意识、学术态度、学术品格。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的学术体系经历了一次转型。但是，体系的转型决不意味着学脉的断裂。20 世纪以来的百余年间，无以数计的学者从个人对于中国学术的理解、对于本土小说文本的认识、对于现实情势的体察出发，展开学术研究。正是这无量数的学者的研究，建构了《金瓶梅》研究的体系，建构了小说以及文学的研究体系。